

每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都能从那个时代
找到深刻的社会根源。

终会按下云头

□李新勇

有人说,最近二十年看不见文学涌现出什么新流派,没有新口号,也没有新主张。冷静回望,文学现场好像确实如此。但并不是说没有新的流派、口号、主张风起云涌,这个时段的文学就是没有特色,没有特点甚至不值得言说的。

而有的人相反认为,这也许是文学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不是靠炫技,而是靠扎实的故事和思考来打量现实、言说人生、传达人性。

我们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大陆文学出现过短暂的井喷,“先锋文学”助推了这一井喷的气势和力量,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等一批以对旧有意模式的反叛、消解为主体风格的青年作家,纷纷用独特的话语方式进行小说文体形式的实验。这批作家,被评论界冠以“先锋派”的称号,他们的作品,被称为“先锋文学”。

对当时沉闷单一的文坛,先锋文学无异于是一股新风。用当下时髦的话来说,先锋文学的出现,成为文学新的增长点,令人耳目一新。先锋文学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正在于此。

由于先锋文学主要通过暗示、隐喻、象征、联想等技巧手段,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使“先锋派”小说成为飞翔在云端的小说,难以被读者理解,很难被受众接受。

小说变得不好读、读不懂,小说就不好玩了。读小说犹如钻迷宫,猜谜语,这种类型的小说大概就走进死胡同了。

作家都是极度聪明的人,不聪明做不了作家。这一群探索者和实践者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苏童创作的《米》《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关注人物命运的小说,以较为平实的语言,对人类的生存和灵魂进行感悟,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回归。

他们前期的先锋作品,替他们挣得了文坛地位;他们回归现实后的作品,为他们赢得了读者和社会影响。

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5部长篇小说中,《江南三部曲》的作者格非、《黄雀记》的作者苏童都是曾经的先锋文学领军人物。

格非《江南三部曲》从清末民初开始一直写到当代,社会历史变迁跨越百年,透视20世纪中国百年内在的精神衍变。

“三部曲”中,《人面桃花》从对奇女子陆秀米投身辛亥革命的事迹梳理,引人连贯不断的人生故事,写的是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从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自上海来到梅城开始着笔,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而《春尽江南》则以一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二十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透视时代巨变面临的各种问题,深度解读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

从先锋追求到“三部曲”的写实追求,格非的小说经历了一个由观念的深度到全面还原生活和历史深度的过程。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格非表示,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

相较于格非《江南三部曲》叙事的宏大和故事的复杂,苏童的《黄雀记》就简单多了。故事人物发生在香椿树街,主要人物三个,两男一女:保润、柳生和仙女。柳生强奸了仙女并用钱买通仙女,让仙女指认擅长捆绑的保润。捆绑、谎言、背叛、复仇,以及命运的逆转,全都在这部作品里。保润在柳生新婚之夜杀死了柳生,仙女不知所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苏童的黄雀是有隐喻的,“捆绑”也是有隐喻的。在具有疯人院隐喻的井亭医院,保润练习被称为“法制结”和“文明结”的捆绑技术,已经昭示柳生和保润的悲剧结局。

传统认为,苏童是个不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在《黄雀记》中,苏童依靠其非凡的想象力,成就了一个精巧细致的故事。这部小说并不宏大,但叙事无以复加地精微。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

至此,当时被比喻为先锋文坛射雕五高手的“北丐”洪峰、“南帝”苏童、“东邪”余华、“西毒”马原、“中神通”格非,当初不管飞得多高,全部按下云头,以各种各样的姿势降落在现实的大地上歇脚了。

对先锋派作家向现实回归原因,有人理解为现实土壤的需要,中国读者的视角是不管你的想象力一个“筋斗云”打出去能打几个十万八千里,都要重新回到现实的土壤中。而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这一批作家都成熟了。

故事好找,细节难觅。支撑小说大厦的,是以细节为核心,表现出来的人情世故。一个作家在其青少年时期所懂得和掌握的人情世故,不足以支撑复杂的故事细节,于是在技巧、技法上标新立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上了些年纪,人生的历练和阅历都丰富了、性格和脾气成熟了,对重大深刻思想的展示举重若轻,细节储备丰富到能够从容地信手拈来的地步,自然会自觉缩减技巧、技法上的匠气,自然就会回归到现实中来。

苏童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很多人说我的作品风格有所改变,这是自然而然的,我在创作中并不是主观要变得严肃,这只是自己的心态变化的一种体现。这话也许道出了从先锋到现实的玄机。

文学艺术上任何流派的形成,必须至少拥有三个条件: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代表性文学批评。作家是流派的骑手,作品是流派的主场,批评家无论拥护还是反对都是流派的助攻。三者同时出场。如果连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这样的平静,若不是文学的荣耀,就是文学的悲哀。

回顾文学史上的流派,18世纪后期在英国以汤普生、海涅、斯特恩为代表的伤感主义,把感性看得高于理性,寄希望于艺术和情感,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19世纪在欧洲以巴尔扎克、司汤达、狄更斯、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欧亨利、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故事写实,思想和主题具有明显倾向性,用尖锐的批判表达作者对社会的干预,但这些干预并非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20世纪30年代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的存在主义,坚持以人为中心,尊重个性和自由,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础上自我塑造、自我成就,活得精彩,从而拥有意义……每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都能从那个时代找到深刻的社会根源。就我们最熟知的中国唐代文学来说,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刘禹锡、李商隐为代表的咏史诗派,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异彩纷呈的背后,是大唐王朝的波澜壮阔。

对先锋派作家向现实回归原因,有人理解为现实土壤的需要,中国读者的视角是不管你的想象力一个“筋斗云”打出去能打几个十万八千里,都要重新回到现实的土壤中。而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因为这一批作家都成熟了。

故事好找,细节难觅。支撑小说大厦的,是以细节为核心,表现出来的人情世故。一个作家在其青少年时期所懂得和掌握的人情世故,不足以支撑复杂的故事细节,于是在技巧、技法上标新立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上了些年纪,人生的历练和阅历都丰富了、性格和脾气成熟了,对重大深刻思想的展示举重若轻,细节储备丰富到能够从容地信手拈来的地步,自然会自觉缩减技巧、技法上的匠气,自然就会回归到现实中来。

波澜壮阔的时代期待风起云涌的文学。于众声喧哗处,方显文学的活力和迷人色彩。



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背后隐含的情。

寻春问腊到蓬莱

□江徐

“转头忽见梅花开,不知谁遣春光来。”闲来刷朋友圈,看到毛老师作了这样两句诗,配图是他家院里的一株素心腊梅。读着,看着,愣了会儿神,屈指一算,离过年已没多少日子。这意味着,立春将近。在印象中,除夕和立春,似乎年年前后脚到的。腊梅盛开的时节,正是一年之中彻骨苦寒的冬季。越是趋于彻骨苦寒的尽头,越接近春暖花开的契机。

南通名人、明末戏剧家李渔,在其美学著作《闲情偶寄》的种植部中谈到了梅花的特性和独创的赏梅方法。他认为,如果以开花次序定尊卑,梅花当属花中之王,因为一年四季最先开的便是梅花。这位力求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古代名士,对于赏梅颇有心得,他说,如果是去山上,就必须带帐篷,围三面,空一面,帐中备炉炭,既可取暖,又能用来烫酒。如此,就可以和二三知交暖和和、悠哉悠哉地边赏梅花边饮酒了。如果是在园林中赏玩呢,要准备几扇屏风,顶上加盖,四面设窗,花在哪个方向,就开哪个方向的窗。如是,这座临时搭建的小屋不妨叫作“就花居”。如果自家庭院中种有梅花,那便算花就人,随时可赏。

若要追求生活的情趣,必得先有感受美的闲心。可是在当下这样来去匆匆、人人低头看手机的时代,你已经有多久不得空闲下来,好好地望一溪云,赏一树花,喝一壶茶?春去春又来,花也年年开,只不过世间少有赏花的闲人。最近为读书平台写稿,顺便跳着重翻《红楼梦》。翻到一回,书里也和书外一样,寒冬腊月时节,下了一夜大雪,众艳齐聚,推举大嫂子李纨执掌在芦雪广开诗社。宝玉早早地往雪广走去,雪地茫茫,一眼望去犹如琉璃世界。走到山坡下,忽有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原来是栊翠庵中的十多株红梅,映着雪色,白雪红梅,好不有趣。宝玉立定,细细赏玩了一回。后来,他又遵姐姐们的趣旨,乐颠颠地冒雪去栊翠庵,折得一枝红梅插瓶。于是乎,这帮生活在大观园也是生活在太虚梦中的公子小姐们,围着红梅吟哦作诗。见姐妹们都有了,宝玉忙依自己所吟诵道:“酒未开樽句未裁,寻春问腊到蓬莱。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孀娥槛外梅。”

同样是对着槛外梅花,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意境。这厢一群青春男女饮酒赋诗,割腥啖膻,谈笑风生;那厢,自称槛外人的妙玉独坐蒲团,诵经念佛。开了,下了,她便走外面,一个人静静地赏梅,从梅花上收集一些雪水,装进坛子,埋在地下,珍藏个三五年,再取出来煮茶待客。别人以为妙玉孤傲难接近,或者怜其寂寞孤单,殊不知正是这份寂寞让妙玉成为妙玉,也正因这份清冷自持,让她拥有清冽高洁的美丽。就像傲雪的腊梅,最合适的开处是荒郊野外,是驿外断桥边,是疏影横斜的寂静湖畔,又或者是游人罕至的山中古寺。如果让腊梅走入人间,沾染烟火,岂不染污它特有的寒香?

有一年大年初三,立春之后的第三天,清晨五六点,我冒着风雨独自前往狼山上面的广教寺。要说是为烧香,向来不信这一套。要说是为拜佛,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好像什么也不为,就是纯粹起了一个想去的念头,于是就去了,风雨无阻。晦暗的天色,湿冷的空气,入山之门的两侧,分别站着一棵高古苍劲、枯枝丰茂如同根须的银杏树。狼山本不高,所以山路更应铺造得曲折迂回,才能让游人慢一点走到山顶。

潮湿的天,潮湿的路,经过“鹅鹅鹅”的骆宾王墓,经过有十八高僧壁画的法游堂,拾级而上,忽见一株腊梅,高及大悲殿的重檐宝顶。那应该是整口腊梅,横逸的虬枝似蟠螭,如僵蚓,花吐腊蕊,一片冰心。我站在殿前仰望良久,又踏上高处的平台俯瞰良久,仿佛这一趟就是为了遇见它,与它倾谈。都说万物有灵,草木亦有本心,不知这株惯闻佛音梵唱的腊梅,是否悟得多情乃佛心、情到深处便成空的般若之智?那日,我在山顶待了一天,到处走走停停看看。在某一堂前,看到堂中悬着匾额“十指成林”,再看落款,竟是板桥郑燮。匾额下坐着个光头富髯酷似鲁智深的和尚,以为他正埋首经书,细查之,发现脸上映出手机屏幕上的光。黄昏日落,我在下山途中又看见这个和尚,差点没认出来,因为他已脱掉僧衣,显出黑色皮夹克,拎一只公文包式样的黑包,赴约似的匆匆下山。山上,山下,这无所不在的人间!

想起林觉民英勇就义前夜所写的《与妻书》,还能背出文中的句子:“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其实,花草本身是无所谓美不美的,就像一位朋友说过的那样,真正打动人的心的从来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背后隐含的情。他在诀别信中告诉妻子,自从遇见她,他总愿天下有情人都能够像他俩一样终成眷属,然而现实是遍地腥云、满街狼犬。他做不到太上忘情,与己卿卿躲进小楼,对窗外的悲怆避而不见。他说,他至爱她,正因为至爱她这一念,让他勇于赴死。“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二十来岁的林觉民,这份无私的大爱,完全出自一颗虽死无悔的赤子之心。

爱,就要全情投入,爱就要爱到纷纷扬扬大雪漫天,哪怕随后就是离别。这样无所保留的爱法,和腊梅的特质很像。腊梅虽然有个“梅”字,其实并不是梅花,两者只能算远亲。反倒是玫瑰和腊梅像异性兄弟,都是浓艳到极致的气味,毫无保留,一往而深。花有花的品德,人有人的天性。有一次,跟一位信佛的朋友聊起什么话题,我说,假如庄子有爱情,会是怎样的呢?如果他轰轰烈烈死去活来地爱着,就不是庄子了吧。对方的回应可谓一语惊人:庄子有爱情,那就是鼓盆而歌。生时既已珍惜,大化何妨鼓盆。冬夜寂寂,想起乡下屋后也有一株腊梅,去年冬天攀枝闻过它的花香。这次过年回去,最好找一只空瓶,到屋后折一枝梅花用井水养起来,可与家人共斟清芬。



雪色(AI绘画)

哲学是智慧学、明白学。学好哲学,领受“时代精神的精华”,领导干部会有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视野、更强的领导力、更精彩的人生。

学好哲学担大任

□凌云

能否自觉地学哲学、用哲学关系极大。李瑞环同志从工人木匠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人询问他成功经验时,他说,光靠努力不行,还要得法,得法就是要学习哲学。这一生当中,他认为学习哲学对他的帮助是最大的,他也用他最朴素、最直白的语言描述了哲学对他的帮助和哲学本身在他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说,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这席话很简单明白地诠释了哲学对于工作、思考问题所起到的作用。

身处当前,学好哲学对于领导干部的意义更为彰显。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深水区,各种思潮竞逐、各种观点纷纭、各种矛盾交织,乱花渐欲迷人眼。很少有哪个时代像我们这个时代一样,主流与支流如些纠结、现象与本质如此复杂、特殊与普遍如此微妙,领导干部可以说时事事都面临哲学的考题。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群众的教育、医疗、养老、就业,还是国企改革、简政放权,无不有主有次、有源有流、有点有面,如果没有哲学的系统论、过程论、矛盾论思维,怎么胸怀全局、洞察大势,主持好一个领域的工作,领导好一个地方的发展?

学好用好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必修课。领导干部的任务主要是出主意、用人才,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解决问题。不懂哲学,就无法把情况搞全、弄准,抓住有用的东西,也就难以执行好政策、处理好矛盾,解决好问题。一个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意志品格、精神境界、领导能力如何,同他的哲学修养密切相关,同他

考虑问题、谋划工作,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一个问题怎么看、一件事如何处理,用哲学的眼光去分析,就能全面把握、准确判断、抓住本质,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反之,不学习哲学,为世俗智慧所主导,缺乏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分析判断能力,模糊了人生价值,迷失了工作方向,急功近利、胡作非为等现象就会频频发生,碌碌无为的庸官、良莠不分的昏官、欲壑难填的贪官也会接连出现。可以说,哲学素养决定了你的认识,而你的认识决定了你的方向、你的行动,决定了你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领导干部学哲学的要求。领导干部作为组织的领路人、协调者和精神领袖,只有学好用好哲学,才能变得有高度、有深度、有广度和有温度。因视野宏大而观照全局,因反思自省而清醒深刻,因逻辑分析而条理清晰,因辩证思考而头脑灵活,因坚守初心而果断坚毅,因憧憬理想而满怀信仰,面对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时才有驾驭的本领,才能行稳致远、永不迷航。

事实一再证明,哲学是人类经验的升华、实践的结晶。学好哲学,领受“时代精神的精华”,领导干部才会有更高的站位、更开阔的视野、更强的领导力、更精彩的人生。

从政杂谈

□杨谔

进入自媒体时代之后,作品的发表与传播变得容易起来。你只要有一部手机,恰巧刷手机时又曾经表现出某种偏好,那么你就会每天都能收到海量的泥沙俱下的相关信息。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看得越多认识得越清楚的,有的原本较为清醒的人由于每天受到“泥沙”的冲刷,“视线”也会变得模糊起来,拿不定主意,选择从俗,更不要说那些对艺术原本就所知甚少的人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与鉴赏,愈是简单易行、花哨平庸就愈能获得关注和功效,人们大多喜欢一快之快,很少有人愿意冷静地去思考未来,“流量就是王道”这句话,从某个角度看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纵容与肯定。

文学艺术对人心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又唯因其是渗透式的,故能深而久,因此,关注艺术尤须关注艺术与艺术家的本质。

关注本质

□杨谔

文学艺术对人心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式的,又唯因其是渗透式的,故能深而久,因此,关注艺术尤须关注艺术与艺术家的本质。去美术馆看画展,碰到一位熟悉的美术教授,抓住机会结合眼前的各类作品向他请教。在一幅花鸟画前我俩同时停下了脚步,我向他请教说:“这张画中植物的大叶是用泼墨法画的,水墨交融后倾倒在好宣纸上的效果确实奇妙,但恐怕不该就此放手。即使是泼墨,泼的时候,泼出去之后,画家也应该有所主导,不能听之任之希望能碰巧。譬如眼前这幅画的泼墨处,画家如果及时出笔‘干预’,骨气纵横,就会不俗。”美术教授说:“画作不会像人一样说假话,能真实地体现画家本人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此画作者虽然贵为名家,但认识水平不过如此,这就决定了他只会这么做。”我们经常说艺术家要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加以表现,殊不知艺术家本人即是事物中的一种,在努力表达事物本质的同时,自己的本质也因此而被揭示。

虽然能说出来的“本质”都不过是某个人的“认为”,事物的本质没有变,而“认为”却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对同样一件作品鉴赏结论却多样的缘由。世上有千千万万种“认为”,常识、常理却不会因此而多变或消失。比如“真金不怕火炼”“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常识也是常理。外部因素固然会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表现),但如何对待“影响”本身,是由艺术家其人(本质)决定的,“认为”决定“表现”。如是故,关于艺术教育与创作,与其把“如何表现”放在教学培训的首位,倒不如把“如何认为”放在前头,更不如把“如何提高艺术家的本质质量(品位)”看作是重中之重。艺术教学尤须循此序而渐进。

优秀的艺术家不应是“专门家”,而应是一名“杂家”“综合家”“思想家”,这也是艺术的本质所决定的。与“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相比,眼下似乎更须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耐心。